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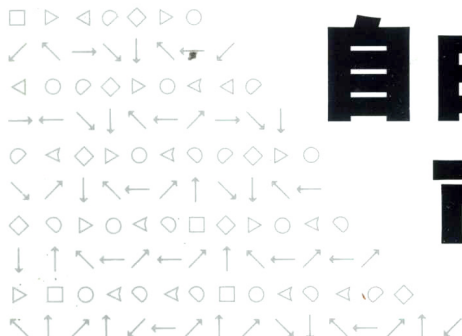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主编 陈昕



自由社会中的 市场和选择



当代经济学译库

[美] 罗伯特·J.巴罗 著
沈志彦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主编 陈昕

自由社会中的 市场和选择

[美] 罗伯特·J.巴罗 著

沈志彦 译

当代
经济学
译库

格致出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社会中的市场和选择/(美)巴罗著;沈志彦
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陈昕主编. 当代经济学译
库)

ISBN 978-7-5432-1789-8

I. ①自… II. ①巴… ②沈… III. ①经济增长-研
究②宏观经济-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2478 号

责任编辑 钱 敏

装帧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

[美]罗伯特·J. 巴罗 著
沈志彦 译

自由社会中的市场和选择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24 层 www.ewen.cc)



格致出版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75 插页:5 字数:121,000

ISBN 978-7-5432-1789-8/F·303

定价:20.00 元



出版前言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

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则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前 言

在我专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写过不少给经济学家同行看的专业论文，我也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写过一些经济学教科书。于是在 1991 年春，《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鲍勃·巴特莱(Bob Bartley)要求我作为一名供稿编辑为广大读者不定期地写一些文章。从那时起，大约每 6 个星期我就为《华尔街日报》编一个专栏，同时我也为其他一些大众媒体写过一些文章。这些工作作为本书的文章提供了原材料和灵感。如果人们喜欢或者不喜欢本书，那么许多赞赏或责怪就应该归于鲍勃·巴特莱了。

为非专业的读者撰写的这些文章已经与我的学术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想我坚持了完善

的经济推理的标准,同时又不得不就各种社会问题向非经济学家们解释这种经济推理的含义。唯一的一次是在1994年1月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的小组辩论中,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鲍勃·索洛(B. Solow)指责我的行为像一个记者。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对我的一种侮辱。这或许是因为鲍勃的情绪不好,并且是在认真抱怨我的观点偏离了他从小就熟悉的“新政”的原则。

在1994—1995年期间我在这本书上花了许多工夫,当时我还是英格兰银行的霍布隆-诺尔曼(Houblon-Norman)研究员。在此期间,我特别受益于同该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执行董事默文·金(M. King)的互动。正是他安排了我这项访学活动。我也十分感谢胡佛研究所及其所长约翰·雷希安(J. Raisian)。本书中的许多思想都是我在胡佛研究所工作时产生的。

我的关于经济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大部分是在我两度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1972—1975年和1982—1984年)期间形成的,特别受益于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乔治·施蒂格勒 George Stigler)、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鲍勃·卢卡斯(Bob Lucas)等人的互相切磋。虽然很难说我在芝加哥大学度过的岁月是充满乐趣的,但可以肯定地说是非常有益的。

到目前为止,我担任教职最长的是在罗切斯特大学(1975—1982年、1984—1987年)。与芝加哥大学相比,罗切斯特大学也许待我更好一点。在罗切斯特大学,我撰写了我的第一本教科书(《宏观经济学》),并且开始同保罗·罗默(Paul Romer)就经济增长问题作持续的交流。

最后,我十分感谢哈佛大学经济系志趣相投、富有成效的学术氛围。我有时候感到自己像在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右翼分子,但是这里有着莫大的宽容和大量知识上的互动。不管怎样,在一个被等同于20世纪风格的自由主义的机构中,代表自由市场的观点,总是具有一些稀缺价值的,特别是当该机构是世界最负盛名的学府时。

目 录

自由社会中的 市场和选择

出版前言 前 言

MULU

导 论	1
1 经济增长	6
民主和增长	6
德国东部的发展和 趋同铁律	16
新旧经济增长理论	21
双城记——中国香港 和新加坡的增长	26
一个国家的最适规模， 或分离的诱人之处	29
欧洲的通向奴役之路： 欧盟的前景	34
关于国债的拖欠	37
秘鲁的民主与经济增长	39
2 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	46
阿根廷和墨西哥：拉丁 美洲货币政策 的教训	46
货币政策：事关承诺	53
英格兰银行的内疚和 荣耀	61
物价稳定的吸引力	65
3 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 经济政策	69
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 的经济成绩报告单	69

MULU			
经济顾问和经济成果	80	第一次年度竞赛	123
预算赤字有多么重要?	86	这种税收赦免一次管用	127
指数化债券	95	选择学校	129
宏观经济政策计划	98	美国式的私有化	133
布什总统的最后		二手烟	138
一个财政计划	103	濒危物种价值几何?	144
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		棒球经济学	149
公共支出	106	任期限制	153
收入不平等问题的	109	乔治·施蒂格勒和芝加	
对富人征收重税	114	哥学派	159
追溯行动和其他资本税		鲍勃·卢卡斯的诺贝尔	
	118	经济学奖	162
4 经济推理的力量	123	在英国	166
争夺美国最佳垄断者的		参考文献	171

导 论

坦率地说，从 20 世纪左翼人士的感觉来看，我曾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于我所遇到任何社会问题，我曾毫不犹豫地认为救治之法包括政府干预，而我可以编制出一套高明的，伟大社会型的计划，将一切事情摆平。我也持有通常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大多数保守派人士既愚蠢又贪婪。

在我 19 或 20 岁左右还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名大学生时，我的这个态度仍然是十分坚定的。我艰难地找到了将我转变为一名自由意志论者，或者更精确地说，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和经验。毫无疑问，接触经济学——在加州理工学院接触了一点，更多的是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对我大有帮助。但是本书的内容多半是干预主义者的观点，这是当时的一种政策倾向——根本谈不上芝加哥学派的自由市场的观点。我的许多左翼同事学习同样的经济学并且仍然保留着他们左翼的政治观点，这是我 16 岁时持有的观点。（我发现直到今天许多左派人士的论点与我十几岁时的观点十分相似，这有助于我与他们的辩论。我

能够理解自由主义者的信仰——以及他们的错误观念。如果我从未犯过同样的左派幼稚病,我就不可能有此认识了。)

一个转折点出现于 1964 年,当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加州理工学院做了一次报告,以支持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总统竞选。曾经有一度加尔布雷斯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迫切地盼望听他的报告。但是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有一种强烈的失望感,我认识到他对经济学和社会的评论没有多大的意义。在 1964 年时,我把这些缺憾归因于他那一天的状态不太好;后来我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是个更为系统的问题。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的课程大部分是技术性很强的经济学,并且基本上是非政治性的。偶尔也有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嘲弄,部分针对他的货币理论的内容,部分针对他关于自由市场以及政府恰当的有限作用的观点。尽管在 1968 年夏我离开哈佛之前,我已认识到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攻击是愚蠢无聊的,主要是出于一种妒忌,但是我仍然坚持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在那命运多舛的 1968 年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初选中,我(通过缺席选举人票)投了鲍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一票。

帮助我向相反方向转变的还有我的第一份职业——在布朗大学当助理教授——的经历。在 1968—1971 年期间,布朗大学是著名的左翼阵地,他们寻找每次机会迫使行政当局屈服于激进分子的抗议。不知何故,越南战争也被作为一个要摧毁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的合理借口。校方居然赞同新的课程计划,并且接受非正统学科的一系列棘手的课程。这一计划是由一位天才的大学毕业生艾拉·马加

齐纳(Ira Magaziner)设计的,后来他将他所谓的才能献给了最近失败的美国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

总的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我有一个表达清楚的哲学思想取而代之以以前,我已经排斥自由主义了。但是我当时正在向自由市场的观点靠拢,并且这种转变受到我1972—1975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同仁的推波助澜。(许多人根据我的文章错误地推断我必定曾经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除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我还深深地受到加里·贝克尔和乔治·施蒂格勒的影响。(我这本书稿的一位评论家把我的许多思想称之为贝克尔式的思想,加里很高兴。)我在芝加哥大学受教甚多的是市场的作用、经济学推理在社会问题中的广泛应用,以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相互作用等课题。

我来描述一下我作为自由主义者(或者说古典自由主义)而不是保守主义或共和党人的哲学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我所接纳和形成的思想,它也是本书的指导思想。(然而我喜欢一位书评者的意见,他说我是“一个不抓任何囚犯的保守分子”。)我的观点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我认为政府具有某种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在确立产权方面。这包含着维护国家和国内安全的意思,以及法律和合同制度的颁布和实施。政府的其他重要活动包括确保(不是生产)基础水平的教育、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保障,以及参与一些范围较小的基础设施投资,例如公路和机场。我认为政府的公共职能应该是适当的这一看法是与这样的观点相符合的,即大多数政府在支出、税收和法规方面走得太远了。

从维持现状的意义上讲,我的观点并非是保守主义的,因

为我赞成一种积极行动的态度，主张取消政府许多现有的计划。例如，我不同意共和党中的布坎南派所提出的许多建议：诸如对妇女流产权实行严格限制的并非出自自由意志的法令、在公立学校中推行祈祷、颁布严格的禁止毒品的法令、控制移民和限制国际贸易等。

我的观点更接近于米尔顿·弗里德曼所信奉的、特别是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中所倡导的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哲学。在那本著作中，他提出了许多与自由市场非常合拍的政策，并且正在引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认真关注。这些政策包括学校的选择、统一的所得税率、稳定货币的规则、社会保险的私人化以及取消约翰逊政府提出的赞助行动计划。（另一方面，我把弗里德曼的宏观经济学看做是走得过远的凯恩斯经济学。）

贯彻本书的主题是确保财产权和自由市场的重要性。本讨论专门论述了政府作用的恰当范围——哪些方面代表了有用的公共政策而哪些方面代表了不必要的干预。

第一章考察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中的一些问题。除了论述一些基本的经济力量，我还评估了与之相关的政策课题，例如民主体制的作用、国家的最适规模以及拖欠国债的后果。

第二章探讨货币政策应该具有的作用和形式。我认为政府应当为私人市场提供稳定的名义货币框架，然后基本上就不再干预市场。这些思想非常符合我关于财产权和自由市场的一般观念，即物价稳定出自这些原则在货币领域的应用。（有些观察家也许会说我还走得不够远，我没有主张政府应彻底不管货币问题。）

第三章论述了财政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我考察的问题诸如：税收的扭曲性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的影响，以及政府债务和预算赤字的后果。这些问题涉及经济效益——例如对投资和增长的刺激作用——也涉及收入的不平等和法律规则。

最后，我要跳出宏观经济问题——我的专业研究的主要领域——将一些基本主题应用于许多微观经济的问题：卡特尔、税收赦免、择校计划、私有化、禁止吸烟的规则、濒危物种的保护、棒球球员市场以及政府官员任期限制的影响等等。在这些应用中，读者们将认识到一种统一的研究市场、体制和政府的方法。

我有时候因为太喜欢作预测而受到人们的批评，但是如果没有预见将意味着什么？一个缺乏思维框架的人能对一些精心提出的问题做出符合逻辑的回答吗？对再次问出的一个基本上相同的问题人们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吗？

将一个模型应用于一个特定主题的方法也许有时候是很微妙的，因此，该研究方法可适用的范围也许是惊人的。但是一旦被应用，结果通常应该是明确的，可预测的。所以，我希望读者们不要对本书中经常用到的分析感到太意外，而是应该被可以解决的课题的广泛性所激励。这些课题可以通过持续应用一些基本原则得到解决。

1

经济增长

民主和增长

试图将民主植入到像海地和索马里这些地方,听起来非常美好,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吗?政治自由的增加会促进经济自由——特别是财产权和自由市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吗?有没有合理的前景表明,在像上述这些生活水平极低的地区,民主的体制能得到维持?历史给这些问题提供了相当明确的答案,尽管是令人不快的答案。更多的政治权利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广义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远远地优先于政治自由的扩大。贫穷国家中掀起的自由——因为有时通常是由外部施加的——往往不能持久。

从理论上讲,增加自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模糊不清的。有些专家认为,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和自由》一书中所说,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按这个观点,政治权利的扩大——更多的“民主”——会促进经济权利的增加,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但是也有人强调了民主有阻碍经济增

长的特征。这样的—个机制往往会使绝大部分人投票表决支持赞成劫富济贫的收入再分配的社会计划。这些计划包括累进的所得税制、土地改革和福利的转移支付。这些计划在有些情况下也许是可取的,但是这样做会增加边际税率和造成其他各种扭曲,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减少对投资的刺激,影响人们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和延缓经济增长。

代议制民主的另—个不利的特征是利益集团强大的政治势力,例如农业集团、环保游说团、国防军火承包商,以及残疾人团体等等。这些集团往往要求制定有利于自己的重新分配资源的政策。这种资源转移会造成阻碍增长的经济扭曲,而且这些计划通常不利于穷人。

权威主义的政府也许能部分地避免民主的这些缺陷。而且,原则上没有什么理由会阻止非民主的政府维持经济自由和私人财产权,一个独裁者并不一定要实施中央集中计划。关于独裁政权扩大经济自由的新近的例子有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和秘鲁的藤森政府。更进一步讲,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开始它们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期间,也只有有限的政治权利;只有到发展—段时间以后,这些国家才开始实行成熟的代议制民主。

然而,独裁政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利的,如果—个独裁者利用他(她)的权力窃取国家的财富并进行非生产性投资的话。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些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就符合这个模式。

因此,历史表明,独裁者可以分成两类:—类是其个人目的常常与促进经济增长相冲突;另—类则是其利益注定了要他全力关注经济的发展。但我们关于确定哪—种独裁者更普